

巴黎風雲起

丁慰慈回憶錄

(三)

五湖四海恣遊賞，美景良辰且放歌

● 丁慰慈

風狂雨急非常時刻

董霖次長在瑞典發放欠薪和路費後，我自己和外交部的關係，算是暫時畫下句點。也誠如葉公超部長在台北動員月會所形容的，閻錫山正在大陸從事籌組「袖珍內閣」那一個風狂雨急的非常時刻。

曾於中國傳教三十餘年在斯德哥爾摩盡力照料我們的藍師母，經不斷委婉地勸說我們這一行人留在瑞典，還以她在中國的經驗，盤問我們之中是否有人會簡單的手工藝，諸如「紙風車」、「吹糖人」、「紅燈籠」和「編織」之類，她說，瑞典人最喜歡此類物事，藍師母的意思，是希望其中有一個同伴能獻出自己的「一技之長」，共同生產，就在當地留下一段時間，以渡過難關。

但這個建議，竟無一人能提出答案，此真所謂「百無一用是書生」也。

瑞典彼時是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但外勞多數是來自半開發的南歐國家。藍師母也托人和工廠接頭，介紹去工廠作輕鬆簡單的手

工，我猜想當是家用電氣設備的裝配一類工作。同事中也有兩位年輕的同事應介紹前去，但過兩天便不再繼續，我問他們工作性質如何？他們答，待遇好，伙食不錯，程序簡單，祇是出工廠時要搜身，「有傷尊嚴」。又是士大夫積習太深之故。

我高中畢業便在貴陽兩次入新聞界，因此和中央通訊社同仁多有往還。彼時，中央社記者郝志翔，在莫斯科與我們相處甚洽。此時，他的職位即由「駐蘇聯」轉「駐瑞典」，至少在那時期可以不用發愁，最為我們所羨慕。

滄海桑田，風雲變幻，郝志翔一動不如一靜，始終留在斯德哥爾摩，他的公子，當時所見到的小學生，從根讀瑞典文，最後取得國家博士學位。今天也應該是北歐華僑中祖父級的人物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由莫斯科撤出的一行人，包括大使館、總領事館、領事館、武官處、國防部派外人員、商務代表和中央社，都一律先後撤至歐洲。

唯一的例外，是駐新西伯利亞總領事呂同崙，他與我在重慶的外交部，有同司共事之誼，所以非常熟稔。之先，他在駐甘肅特派員辦事處科長任內，結交權貴，挾持長官，聲勢煊赫，夏特派員維稔調部工作後，到處訴苦，因此部內許多同仁，對其跋扈行爲，多人均爲之側目。

我在最初以警惕之心和他見面，不過見面後卻對我十分友好，一直到莫斯科，他從任所到首都時，總要彼此見面，最後於大陸政局瀕臨瓦解時，在最後一次見面表示新政府就成立，「中共總需要人才」，我決定回大陸等語。在我，當然祇有洗耳恭聽。十月二日克里姆林宮承認中共後，我們還在通話。最後一次通話時呂同崙說，「我很想和你們同行，但已不能離開此地了」。這就是駐蘇人員中一個獨特的例子。

攜帶妻子到達巴黎

離開莫斯科這群人，貧富不一。除開大使外，由於蘇聯物資缺乏，留蘇期間久的，

擁有兩萬美金者，大有人在。此數字的購買力當合今日的二十萬，瑞典既然不願住，其後多移民美國。

當時第二次大戰結束未久，蔣介石委員長還是新聞傳播的名人，一位荷蘭萊頓大學習中文的身裁魁梧的學生，持一木刻版的西遊記殘本，到旅館來相晤，見面後要我教他中文，每次來時，他身著彼時蔣委員長穿的黑色斗篷，在進門時向我作一個立正的姿勢，口呼 CHANG KAI-CHEK。如此有兩月之久。在我們談話中知道了萊頓大學是歐洲學習漢文中心之一。也了解說荷蘭語的他，到斯德哥爾摩三個月後便可以全部掌握瑞典話，因為兩者都是德文系統。這位不速之客的荷蘭朋友，解除我們在旅舍的部分寂寞，也因為他而增加我對民俗風土、生活習慣的一些了解。

瑞典經一百五十年的承平日子，國富民強，家給人足，十二月初，燦爛的霓虹燈，鉅型的聖誕樹，已在豪華的百貨公司門前亮相，大家小戶，也已經在著手張羅聖誕飾物和家庭禮品，熙熙攘攘，呈現一片太平景象。

心中充滿花都的誘惑，終於揮別了那斯德哥爾摩的寧靜安詳的『國王大道』，帶妻和三個稚齡的孩子，乘一日一夜的火車，到達瑞典南方港口 Tjelleburg 再改搭汽輪，經三夜，到達西德北部港口基爾 (Kiel)。休息了一晚，改乘歐陸火車，經四十分鐘到漢

堡，沿線由比利時的布魯賽爾，終於到達了我們夢中的巴黎。

巴黎的長途火車，車廂相連，往往達五六百公尺，摩肩接踵，爭相上下，我們一家五口下車到站，照料『大搬家』的行李，十分不易，就是到站接客，亦頗困難。我扶著攜雞，加上隨身大小箱籠，幸承前駐中央亞細亞安集延的胡鴻烈領事及夫人，至車站照料，終於順利地到達住所。

我們被安置在喬治五世大街的一家相當規模的旅館，旅館名稱已忘記，因為它被第一層樓中國人所開的『天下樂園』的易於記憶的名稱所掩蓋。時當冬令，正是旅遊淡季，法國適處戰後，多黨內閣，經濟不振，美元頗為吃香。我們一家五口，在第一層樓，賃下大約十二席大的房間，還帶相當寬裕的浴室，每日祇合美金五元。天下樂園與大使館相鄰近，距香榭里舍大道也不遠。對我這個漫無目的地的遊子而言，已經感覺到非常滿意的了。

翁文灝批評蔣介石

次日在天下樂園早餐，甫行坐定，倏然瞥見前行政院長翁文灝就在我們的鄰座。我向他致候，問他房間的號數後，約我次日下午的飯前，去和他作一晤談。

翁氏早年因車禍，面部有疤痕且略變形。抗戰期間主持資源委員會時，若干工廠西遷，裨益大後方生產，是翁氏重大的決策，

而執行這個方案的，就是後來在台任國大代表的粵籍林紀庸。

一九四二年極度親蘇的盛世才轉而投靠中央，重慶派了第一流人才圖協助新疆建設，乃派林紀庸為建設廳長。不料盛氏反覆無常，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一日突然將重慶所派人員在一夕之間投入監獄，祇有監察使羅家倫及署中人負例外。

我服務於外交部駐新疆特派員公署，因此與林紀庸同一天入監，也同一日出獄。盛氏謀叛不成，由徐恩曾押解赴渝任農林部長。我最早從迪化返重慶，林紀庸面託將事變的經過詳細報告他的頂頭上司資源委員會委員長翁文灝。見面後我將自己經歷的痛苦經過，詳細地向翁氏陳述，令他也十分受感動而印象深刻。這便是我與翁文灝相熟識的起因。

丁文江、翁文灝和李四光，是國際有數的地質學家。翁氏被任命為資源委員會委員長時，抗戰方殷，西北方面石油正待開發，所以他對礦產的勘查、採掘，尚多有可為之處。而事實上亦確有鉅大貢獻。及至他當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長時，則祇是利用他在國際學術上的名望，反而不能發揮他在科學上的成就於萬一。

我按時去訪，他談了許多往事，但說話相當含蓄，不似那些高談闊論的黨政界人士，常不經意地說出那些信口開河、自欺欺人的話。資源委員會是一個處理「物」的機構

，是非多少，易於裁量，而行政院則是五花八門、三江四碼頭、各路英雄好漢集中之處。加之以章則紊亂，政出多門，重床疊屋，往往權責失所依據。翁文灝回憶由資源委員會調任行政院秘書長時，他若有所思地以深沈的語氣說：『許多公文，簡直無從批起』。

翁文灝對當時大陸軍隊土崩瓦解的情況，不勝唏噓，提到他的名字被列為戰犯一事時，他祇有苦笑。

翁氏最後總結他多年來涉足政壇的感觸，他批評蔣介石總統：

『蔣介石，想學史大林，但又學得不像』。

『他將陳立夫、陳果夫培植了很大的勢力，但是又不肯給他們組閣執政』。

說到這裡，我感覺到這一位馳名世界的科學家，其久藏於胸中的千絲萬縷多已吐出，不能再事打擾，乃興辭而出。

凌孟事件驚險萬分

我到巴黎時，駐法大使館門禁森嚴，可稱是『暴風雨後的甯靜』。不過使館前仍站著法政府所派的崗警，除自己所持護照外，尚須崗警與樓上的辦公室通話，詢問身分，才能入館洽事。

事情是這樣的，早於一九四九年八月，政府因遷徙流離，數月發不出外館同仁薪資，那時我們在莫斯科大使館，即曾接到由巴

黎寫出之函件，鼓動大家早日脫離，索欠薪津準備『起義』的通函。但響應者寥寥。九月三十日，由法致各館通函者，便公開表示脫離國民政府，此即駐法大使館於風雨飄搖中所發生的凌孟事件。

為首的為代辦公使凌其翰。他原任禮賓司交際科長，後調外交部駐甘肅特派員，返重慶後調駐法大使館任公使。孟翰如原任人事室幫辦兼科長，繼調任駐法大使館參事。不久前，適駐法大使錢泰因車禍受傷住院，館務迺由公使凌其翰代理，稱為『大使館代辦』。

參事孟翰如，在一年前即已調部，早已領到川資和薪俸，但他遲遲不行，原因不僅因為戰亂，他更打算『時勢造英雄』，想夥同他由駐智利大使館來法的弟弟孟復，做一番『陣前起義』的大事業。

十月二日，凌孟等串連領館同事共九人，拍發電報給周恩來『效忠』，周覆電要他們『堅守崗位』。

緊張之中雨過天青

其時國民政府由廣州撤退台北，外交部在代理部長葉公超、次長胡慶育、時昭瀛的帶領下，業務已陸續開始正常運作。凌孟叛變消息傳出，外交部以救火的心情，立即調駐英公使段茂瀾後調三等秘書趙金鏞到巴黎，駐荷蘭大使館一等秘書斯頌熙以出差名義調法辦事，同時原任條約司專門委員兼幫辦

陳雄飛也新任駐法大使館參事銜一等秘書。段茂瀾、趙金鏞、斯頌熙這一批同事，都是『受命於危難之際』。尤其是陳雄飛，不僅是『見危受命』，而且由廣州撤退到台灣時，祇是下飛機後與妻子相聚不及一日，次晨便時由外交部所事先為他豫備好的川資、護照和機票，凌晨即赴松山機場起飛，他的新任官階，比在重慶的底薪還低。他絲毫不計較而毅然趕赴前線，這真所謂『為人不當差，當差不自由』了。

除上述馳援人員外，原大使館的一等秘書謝東發、二等秘書耿家弢、會計專員郭福培，以及總領事蔣恩鎧，都屹然不動。尤其是郭福培堅持『背書權』，拒開支票，而使館產得以保存。使館頓呈新氣象。

但事件還祇是開始，凌孟等人，卻仍繼續到館『上班』。段公使履任後，出其不意，於十一月三日清晨，率領全體同仁，閃電接收凌等所主管的檔卷，重新調整辦公室，並下令不許凌孟等人入館。

凌孟突然間被拒入館，始如大夢之方醒。次日，回程邀集使領館共九叛徒，徘徊大門外，嗣竟乘隙擠入，進入會客室欲挾持段代辦為人質，陳雄飛等急從四樓趕下隔離，叛徒等即以走狗、殺人犯等粗鄙語言詆毀館中同仁，但陳雄飛則哈哈大笑，使緊張空氣頓時緩和。段公使俟機下樓，乘車赴法國外部請派警保護，另一方面，時在館外的斯頌熙，立即邀集浙籍同鄉，連同愛國學生芮正

舉等數十人，由館門進入。由於一些僑民可能攜帶防身武器，假如雙方對峙局面惡化，即可能肇事端流血，而無法善後。陳雄飛見事態危急，乃立於梯邊極力攔阻。凌孟等雖飽受驚恐，但僅受輕微傷害。不過凌孟等心有不甘，反向巴黎地方法院控告巴黎「三民導報」發行人陳楚本，於是使館經派負責領務的梁宗恒出庭。陳楚本因陳雄飛未親自為他作證而對之頗有怨懟之情。殊不知外交官享有治外法權，理不該出庭作證。惜僑領對此未能了解。因而引起極大誤會。

我家五口於十二月初抵法，凌孟事件在緊張之中已雨過天青。叛徒主要領導人邁返大陸，但有的徘徊猶豫未去，有的則終其身留法。大有「枉作小人」之歎。尚未去之中的副領事蕭君石，盛情地邀請我全家隆重晚餐，席間為我大肆描畫未來「社會主義天堂」的遠景。我甫由「工人無祖國」的聖地出來不多時，對蕭君的幻想曲，祇有洗耳恭聽的分了。蕭君石的招待並未有為我洗腦之意。內中卻有一段情，他在法習鋼琴，但老師告訴他幾頁名譜，祇有在莫斯科才能找到。他寫信求我幫忙；我一向對朋友係成人之美，因此接信後好幾次坐館車到音樂學院洽購，教授們也極熱心幫忙。不過延續到第四次，教授們見我便迴異前昔，臉色很難看。莫斯科是極敏感的地方，我雖成功三次，但事實上卻實實在在得之不易。而此點卻無論如何不能向蕭君石「丑表功」。心想，好在

他不久以後便會親身感受和體驗，或許在某一個時間會設身處地想而回憶起來，我這個朋友辦此事之非等閒可比了。

中法外交風雨飄搖

我再回憶起來，十月初駐法大使錢泰事禍的重傷，使得六日段茂瀾就自倫敦任所以公使名義調赴巴黎任中華民國駐法代辦，其時使、領館凌其翰、孟翰如、王思澄、錢能欣、唐祖培、龔秉成、胡有粵、蕭君石暨章祖貽等九人，均已先於十月二日向北京中共政府通電效忠，且凌其翰在段代辦抵達巴黎任所之前一日，已搶先一步到法國外交部向亞太司長貝揚斯作口頭聲明，謂「已脫離國民政府，效忠中華民國」等語。但對方卻鄭重答覆稱，法國尚未承認人民政府，但可將你的外交待遇延至年底等語。段茂瀾當時奉命到館時，由於叛變人員仍照常上班「待命」，所以無異於是單刀赴會。所幸由歐館所調的人和自台北飛法者的陸續到達，再配合原館內忠貞之士，所以得暫時穩住陣腳。其間段茂瀾在法國外交部辦公室的臨時草擬照會，以及在法國主要報紙發表新聞公布叛變經過和其本人奉命代辦館務并已由法政府派警察保護中華民國大使館等事實，都是在剎那之間所辦的應變措施，而使得在那警耗頻傳的危急時刻，收立竿見影之效。

誠如一九五〇年一月九日邵力子自北京致凌其翰書中有云：

「周總理深歎，國民黨舊壘之中，以外交人才為最少。兄等為外交界首義者，其關切重視，自無待言」等語。這是邵力子代周恩來說的話。至於其後中共對凌孟等如何「關切重視」，祇有讓他們本人出來證明了。

凌孟等本來準備在十月十日「起義」，但不料卻提前為十月二日，使他們不免有手忙腳亂之感。其原因乃由於當時我國所提之控蘇案，因此莫斯科不得不催促中共立刻成立政府，並立刻加以承認，以便克里姆林宮對我的控訴在聯合國大會的辯論中便於因應。一九五〇年一月六日，英國承認中共，而法國撤銷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承認，竟然遲了十五年，這其中也有一些複雜的原因。我政府播遷台灣，凌孟等通電效忠中共之時，適逢法國葛義內閣倒台，群龍無首，政局極端不安定，顧不及作外交政策上的任何考慮。及至英國政府承認中共，又適值天主教黨領袖皮杜爾組閣，持堅決反共之立場。所以段茂瀾的駐法代辦職守，在風雨飄搖中，也維持了七年之久，其間主要的原因，是法政府正維持越南殖民政權，苦戰經年，而中共承認了胡志明。以迄莫邊府崩潰。因此，一直拖到反共著稱的戴高樂上台，大刀闊斧收拾越南和阿爾及利亞的殘局，法國外交政策改弦易轍，才承認北京的人民政府，這就是我維持對法外交十五年的原因。